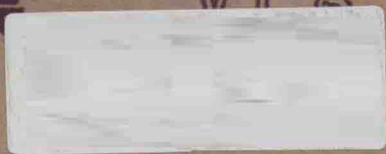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教育評論集



我之三民主義教育觀

曹聚仁

中國的教育方針混沌了十六年，纔摸索着三民主義來做教育的方針。往年，黨化教育突然成爲教育界共同口號，甚囂塵上，來了許多紛歧的議論；及到現在，纔把黨化教育正名定義改爲三民主義教育。我對於這個有意識的改進，很想參加一些意見。

A 過去之中國國民教育

「所謂教育」，包含着兩方面的意義：一方面順着個性陶成一個完全的自我，一方面順着社會性陶成一個完全的公民。國民教育便是第二方面的事。古希臘雅典斯巴達，不拘男女，必受教育；第一，強健體力；第二，陶冶愛國心；目的既在養成健全的市民，可說是偏向着公民教育。中國古代教育，個人既已較社會的重，宋明

理學勃興以後，個人色彩，益加深濃，個人修養；是教育的唯一職務。「主敬」，「主靜」，「克己復禮」，全是個人修養話頭。君臣父子之道，也是個人對個人的私德，和社會無關。皋陶爲士，舜之父殺人，在公民的地位講，他是犯了國法，當然有國法可以裁判，而孟子偏提出「竊負而逃」的辦法。婦人死了丈夫，嫁與不嫁，從社會的立場說，無所得失；理學家偏要說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在消極或積極的個人道德教育之下，公民道德觀念，日趨薄弱，那是必然的。宋明清一千多年間，在中國只有個人教育，沒有國民教育，只有健全的個人，沒有健全的公民，造成一盤散沙的局面，到今日還無從收拾。

甲午以後，學校代替了舉業，公民觀念還不會覺醒。學校設修身科，意思就是說你該修理你自己。觀察學生，首重品行，就是表示個人生活比團體生活更重要。我們所見到的修身教科書，全是講的這麼一些話。改修身爲公民，不過是五六年間事，還是五四運動所喚起的。講公民教育的人，先前主張軍國民教育，拿日德做模範

；把青年造成武士式的健兒，想使中國造成一個強國。後來主張職業教育，拿美國做模範，想使青年有生活的技能，使中國富庶起來。後來國家主義派也提倡過一個主張，共產黨也想出一套話來收羅青年；但，事實還是事實，偏面的理論，畢竟失敗了。

B 國民教育之第一義——民族主義

中國的國民教育應該拿什麼做標準？當然要依據客觀的事實——國情——來做理論的根據。國民教育的方針，在空間時間的限制之下，要放之天下而皆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歷來定標準的人，不是頭痛醫頭，便是拿人家的藥來醫自己的病，所以不會有成效。我們先看看中國過去的歷史，再看看自己所處的地位，那就會明白我們所需要的是那一種國民教育。

國際情形像網一般錯綜，分析起來，有三個傾向：甲，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

間之各個衝突；乙，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之階級鬥爭；民族與民族間之生存競爭。自然，他們都想拉我們入夥，我們就自己的地位論，民族競爭存比任何都重要得多；即以世界立場論，也還是民族競爭是第一義。十九世紀以後，帝國主義的流毒所及，最受苦的是有色人種，其次才是歐洲方面無產階級的人們。歐洲人初得美洲的時候，全歐資產驟然暴富起來，憑藉了這龐大的資本做工具，便造成今日帝國主義之國家。今日無產階級所以受資本階級的壓迫，根本還是有色人種被侵掠的自然結果。這是一方面的話。在其他方面，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，完全爲他自己本身的利益；弱小民族的利益並不會在他們的眼裏。無產階級革命即成功，有色人種依然還在被掠奪被壓迫的地位。所以在一切有色人種看來，決無參加階級鬥爭之必要。並且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只能解決分配問題，不能解決生產問題，歐洲的人口過剩，依然非階級鬥爭所能安全處置的。在我們講民族競爭的人看來，所謂弱小民族不過一時生活工具的落後，並非智力有所不及。讓弱小民族在各自境域發展

自己的文化，也可說是「天賦人權」，不容毀棄的。白色人種侵害了一切有色人種，歐洲的一切問題不但不會解決，糾紛反而日盛一日；假使能悔改侵害之非計，讓各民族各自發展，則平衡發展的結果，物產財源，一定可以驟增十百倍，歐洲人民的困苦，便可藉此昭蘇了。但是，白色人種的迷夢決不會醒悟的；惟有中華民族站起來，纔能擔當世界和平的責任。所以孫總理說：「中國如果強盛起來，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，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；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，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。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，去統一世界，成一個大同之治。」——這個便是我們要把民族主義定為國民教育標準的理由。

C 國民教育之第二義——民權主義

「法治」和「禮治」，在戰國時代有過很重要的爭辯。在秦代，法治曾經試驗過一次，可是完全失敗了；漢以後，禮治不即不離地隱伏在思潮裏面，法治有時稍微

抬頭，便要受打擊。這個情形，正可以和歐洲情形作對照。羅馬的光榮雖然早已過去了，他們的法律觀念依然構成歐洲政治的骨幹。他們的暴君和中國完全不同，除了享樂以外，還歡喜和人民發生直接交涉。路易十五時代，滿街都是警察。所以他們人民最渴望的，便是自由。近三百年的歐洲政治史，也可以拿「爭自由」三字做標幟。在中國，昏君以享樂為第一件事，斷送江山，他也不問。賢君以收羅士的階級為職務，和人民並無直接交涉。人民呢，天高皇帝遠，不蹈到虎尾上去，可以安身立命。所有的「自由」，被家族剝奪了去，固是常事，却很少是被政府剝奪去了的。所以我們的國民，並不需要爭自由。孫總理把民權主義安在平等上頭，真是確當不移！

孫總理替「平等」下界說說：「社會上的地位平等，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。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，自己去造就。」這不但糾正歐人的平等觀念，並且，把中國一向放棄國民責任的弊病完全改正了。中國向來的政治觀念，都是消極的，

或者可以說是抱的放任主義。政治所以腐敗，就在人民不知道去運用機器的緣故。孫總理叫人民認識自己在政治上平等地位，叫人民擔起「天下興亡；匹夫有責」的肩仔，叫人民知道管理政府的方法，雖不必人人去管理國家這輛大機器，却必須人去管理在管理機器的政府。換句話講：我們把老莊化的舊國民改造了，使今後的國民，都會用選舉，罷免，創制，複決四個大權。這個便是國民教育要用民權主義做標準的理由。

D 國民教育之第三義——民生主義

「民生」兩字，淺近地說一說，就是「吃飯」。「天下無如吃飯難」一句話，只能說出一方面的意義；其他方面，我們還得補充意義來說說：「要自己掙飯吃，不要搶人家的飯吃。」歐美的學者，如馬克斯，列寧之倫，他們所注意的是搶飯吃的現狀，所以提出共產主義來解決這個分配問題。孫總理所注意的是掙飯吃的現狀，

所以提出民生主義來解決生產問題，同時也解決分配問題。

封建制度的毀滅，在中國是二千年前的事，比歐洲早過一千多年。封建制度的反動傾向，便是個人主義的復活。歐洲的個人主義，有工業革命做他的背景，所以形成資本主義，所以形成搶飯吃的局面。中國封建制度中落以後，個人主義也很蠢動；漢晁錯說文帝謂：「今農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，不過百畝；百畝之收，不過百石。春耕，夏耘，秋穫，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給繇役。春不得避風塵，夏不得避暑熱，秋不得避陰雨，冬不得避寒凍。勤苦如此，尙復被水旱之災，急政暴虐，賦歛不時，朝令而暮改；當其有者，半賈而賣，亡者取倍稱之息；於是有賣田宅，鬻子孫以償債者矣。而商賈：大者積貯倍息，小者坐列販賣；操其奇贏，日遊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賣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蠶織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。亡農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。」（漢書食貨志）這個情形，和歐洲工業社會並沒有什麼不同，所不同者，他們

資本益集中，大地主，大企業一成不敗而已。從漢朝到現代，二千多年間，中國的社會情形並沒有十分變遷；沒有工業上精利工具的幫助，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；而歷來學者和政治家都主張「限民名田，以贍不乏」，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。孫總理提出「耕者有其田」的主張，在農業中心的中國社會，當然也是最適合的了。

所以，我們希望今後的國民，不要做工業落後的國民；同時，也不要重蹈工業社會的覆轍，再演欣美不可收拾的惡夢。我們要自己掙飯吃，不要搶人家的飯吃，這是民生主義的主旨，也是國民教育要拿民生主義做標準的理由。

孫總理說：「在最近十年間，是中國的生死關頭。」中國存亡的責任，完全在青年的肩仔上。如何能使青年擔當這個責任，我們辦教育的人，不能不認清這個標準努力去做了。

（民國日報）

黨化教育的銓釋

姜琦

自前年國民革命軍從珠江發源地發展至長江流域，遂逐漸形成今日形勢以來，在教育方面，也隨之發生大變化了。別的不用說，單就『黨化教育』一名詞而論，幾成爲全國教育界之流行語。或講演，或撰述，可謂發揮盡致了。現在我不揣冒昧，再把我自己對於『黨化教育』的一種解釋寫出來，與當世教育界同志們共同討論一下。但是我未說明『黨化教育』以前，先要說『黨化教育』一名詞，自產生以來，國內教育界人士對於這名詞，贊成與反對，各有其人，贊成者當然屬於中國國民黨黨員，而反對者是屬於國家主義派及共產黨中之一部分人士。據反對者的意見，國家主義派說：教育是發展兒童的個性，但是黨化教育是限制兒童思想的自由，結果遂使失學術之獨立的研究，大背於教育的原則。這種論調，是否正當，以後再說。中國共產黨黨員說：俄國無所謂『黨化教育』，即使有其事實，也不過限於養成少

數辦理黨務人才罷了；然不是對於一般人民而設施的。（見嚮導寸鐵署名實者之語）他的言論，是否別有用意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是據我的意見，我以為俄國與中國所處之情形是不同的，那麼，兩國所有『黨化教育』的涵義，當然是各異的，什麼地方有差異呢？也以後再說。換句話說：等我說明我自己對於『黨化教育』的解釋的時候，把贊成及反對兩方面的見解，附帶地批評一下罷了。

我以為『黨化教育』，應該有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解釋：第一種廣義的解釋，是對於一般國民而言的；第二種狹義的解釋，是對於少數黨員而言的。先就廣義的對於一般國民的解釋而論，所謂『黨化教育』，就是『國化』，就是『社會化』（廣義的意味）。大凡一個國家，或一個社會，它的教育宗旨或方針，必須使全國人都化為本國的，個個都能夠發揮本國民族的精神，並適合於現在各該社會的需要與要求。我以為『黨化教育』，不算是希奇的，也不是新創的。世界各教育先進國，雖沒有『黨化教育』這個名詞，然而它們所施行黨化教育的精神與設施，早已存在了。

，恐怕我中國很難趕得上它們。若照這樣說起來，那麼，爲什麼歐美各國（除俄國外）不用『黨化教育』一名詞呢？我以為這個疑問是很容易地解決的。因爲歐美各國，除掉俄羅斯與意大利祇有一黨治國以外，都是有二個以上政黨。況且無論那個國家，它的建國主義或方針及它的國內所有政黨的治國政策或方略，不可混爲一談，前者叫做『國是』，後者叫做『政策』。『國是』是硬性的，是永久固定的；至於『政策』呢，它是軟性的，也許有時候是可以順應時勢與潮流而變更的。請舉最近例：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就是建國主義，是永久固定的，但是它對待共產黨的政策是可以隨時變更的，民國十三年改組的時候，是可以容共，到了去年七月間，一爲時勢所迫，不得不反共了。更進一步論：歐美各國的政黨大半是建國以後所發生的產物，換句話說：它們都是依照建國主義或方針而各自想出一種政策或方略，去實現那種主義或方針的東西。所以各個政黨的政策是不同的。甲黨有甲黨的政策，乙黨也有乙黨的政策，它們的政策只管不同，但是它們所依照之國家建國主義或方

針，絕對地不許它們有所變更的；至於俄羅斯的共產黨及我中國的國民黨不是這樣的，因為這兩個黨是建國的，建國以後又去治國，換句話說：有黨然後有國，不像其他各國，先有國然後有黨；同時中俄兩國不容有第二個黨之存在，所以俄羅斯祇有一個共產黨，我中國祇有一個中國國民黨。這兩個黨，若就國的方面而論，黨就是國；若就黨的方面而論，國就是黨。國與黨，或黨與國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是不可分離的。近人把中國稱做『黨國』，就是根據這樁理由。（按蘇俄共產黨黨員，不承認有國之存在，欲打破國界，倡設所謂『第三國際』，而以一黨控制全世界，所以他們對於我的『黨國』觀念，也許不肯贊同。再我現在所謂『中國』，是指『民國』而言，然非是概括歷史上之全部中國而言的，唯恐讀者諸君有所誤會，故關於這一點，附誌聲明。）照這樣推論起來，那麼，中國國民黨儘可稱做『國黨』，決不可沿用『政黨』（Party）的名稱。近人把中國國民黨繙譯英語為（China's Kuo Min Tang），不為（China's National, or People Party），這是很有絕大的理由。總之

，我中國國民黨有建國與治國兩重責任，所以總理孫中山先生有『以黨建國』與『以黨治國』的主張。但是我們須要注意的，是『以黨建國』與『以黨治國』不可混爲一談。我前所說過了的建國主義或方針，就是指『以黨建國』而言的；治國政策或方略，就是指『以黨治國』而言的。前者是建國之三民主義，後者是依照三民主義之一切施行策略。試問歐美各國的政黨，有沒有兼擔負兩重責任呢？我可以簡單地說：它們祇有治國的責任，而無建國的責任。換句話說：歐美各國所有建國的責任，在各國政黨未經組織以前，早已爲人所擔負了。就是民國元二年時代之中國進步黨，也是這樣的，所以經過短期間就消滅了，不能與我中國國民黨一面建國，一面治國的國民黨所可同日而語的。我中國國民黨經過辛亥革命成功後，自民國元年起一度建立中華民國以來，迄今十多年，對外雖屢經失敗，然終不顛仆；對內雖屢經改組，然主義一貫；到了現在，又幾完全達到以這種確定的三民主義去治國的目的。由此推及將來，仍舊如此，這確是一個永久存在，始終如一的國黨。再就國的方

而而論：我中華民國確是一個在中國國民黨治下的永久完全統一的國家。

根據上所述的『黨卽國』與『國卽黨』的理由，那麼，我可以拿數學的方式來說明：『黨化教育』就是『國化教育』。再從廣義的社會界說說起來，國家的組織是一種社會，所以又稱『黨化教育』爲『社會化教育』。我現在再說我現在中國是一種什麼國家。我想這個問題，誰也能解答說：現在中國是一種整個的完全無缺的三民主義的國家。三民主義是民族，民權，民生三主義，所以我們可以說『黨化教育』是民族主義的教育，民權主義的教育，及民生主義的教育之統合體，可以渾稱之曰『全民教育』(Democratic Education)。但是這裏必須要注意的，現在我既說『黨化教育』就是『國化教育』，那麼，『國化』一語，驟觀之，似乎近於國家主義派的口吻，然仔細一按，實大不然。怎麼說呢？國家主義派常常說教育必須適合『國性』，以謀國家之獨立；這種主張是很偏狹的，是僅僅當於我中國國民黨所主張『黨化教育』中民族主義的教育之一極小部份；至於民權主義的教育及民生主義的